

征文选登

1985年,是我军历史上不平凡的一年,更是我个人经历中最不平凡的一年。

那年春夏之交,我正率领某军机关干部学习坦克驾驶、通讯、射击三大技能,突然接到军区通知,要我赴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

抵京后才知道,中央决定对军队建设作重大调整。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上说,根据对国际形势分析判断,短时间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我军建设指导思想必须实行战略性的转变,由随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大战转变到相对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并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裁军100万。其中包括由11个军区精简合并为7个军区。

遵照中央军委决定,福州军区 and 南京军区合并,我被任命为合并后的南京军区首任参谋长。接到任命,我感到压力空前。南京军区历任参谋长,其中有张震、张爱萍、张才干等名将,还有张祖谅、肖永银、张希钦等首长,都是久经考验、身经百战、德高望重,而我这时刚过41岁,是历任军区参谋长中最年轻的,资历浅、治军经验少,根本无法与前辈们相比;上任伊始,又面临军区合并、大量裁兵等艰巨任务。我认识到,这是党中央、中央军委的信任,更是老一辈革命家对年轻一代的期待,一定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我带着压力和动力,走上了新的岗位。

在军区党委领导下,我和同志们不分昼夜工作,制定出精简整编方案,包括各种计划、部署、条令、制度,详尽而又繁复。鉴于福州军区战备任务繁重,为防止合并过程中发生意外,我们还组织情报侦察部队严密监视形势变化,及时调整海防部署,精确制定交接计划,防止因突发事故出现指挥权真空。

军区党委就合并工作专门提出了“四讲”原则,即“讲政治、讲大局、讲风格、讲纪律”,一切按中央军委和

总部合并要求办。领导机关带好头,又是做好合并工作的关键。在常委会上,福州军区政委傅奎清说:“我姓傅,福州来的干部都当副职好了。”大家听了都笑起来,在笑声中体会到了傅政委的大局观念和大将风度。我接着发言说,中央军委确定两军区合并后机关人数比例,南京军区为三分之二,福州军区为三分之一,合并应严格按照军委指令办,我们司令部已调整出三分之一的职位,包括16个二级部中三分之一的部长职位,福州军区少来一位也不行。

在党委会上,我强调对福州来的干部,一定要与南京同志一视同仁,特别在提拔使用上,要择优选用,条件相当的,还要优先使用福州同志。在推荐干部时,我们积极推荐福州过来的军务部长任某省军区参谋长。这是两军区合并后第一次提拔军职干部。“一打纲领不如一个行动”,任命公布后,新军区司令部机关凝聚力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原福州军区一些老同志担心合并后,因机关在南京没人管他们。我专程到福州表示:我们一定会坚持“五个一样”(即“在职与退下来一个样、南京干部与福州干部一个样”等五条),请大家放心。军区还马上成立了第二老干部服务处,负责接收管理。后来证明,福州老同志退下来安排得比较好,甚至还优于南京的老同志。他们说:“不要看参谋长年年轻,处事倒很公道。”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激励。由于坚持“四讲”,两大军区合并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受到了中央军委和总部一致好评。

两大军区合并后,我们根据形势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新规定,有力推动了部队正规化建设。我们培育有效机制,大力推进干部学习军事理论,研究未来战争,形成了“善学习、重研究、敢创新”的氛围,机关效率有了明显提高。许多老干部看到两大军区合并后呈现的新气象,纷纷称赞新的军区领导机关不愧是叶挺陈毅粟裕带出来的“老司令部”。

十日谈
（彭瑞高 整理）
明日请看《在东
人民军队中的上海兵 海巡逻的日子里》。

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成为十七届六中全会重大课题,应该是切准了时弊。时代应该多一些有社会担当、文化素养、人生抱负的人。把“上名校,挣大钱,当大

人生的功利与信仰

黄 胜

官”的父母之命作为人生追求,真是世俗的功利、教育的失败和人生的误区啊。

市场经济讲求效益,利己利民也利国。但仅以工薪高低评判人的成功是种肤浅。官员现称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进入仕途有天

时、地利、人和之说,有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以官位高低衡量人的价值本身是种无知。三百六十行都能取得成功,只有高尚的人格,没有低贱的职业。多维的现代社会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更多,大可不必往独木桥走。只要对社会有用,能在自己领域发挥自己的能量,有所建树,虽不辉煌,也足慰平生,更为世人所尊重。这样一想,路就宽了。家长和学子们的心理压力不就小了?

《孔子家语》有言:“芝兰生于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以穷困而改节。”我想其蕴含的文化内涵,足资对“官”、“财”的品鉴和对人生的勉励。

位著名的电影事业家,以北影和上影为平台,为铸建后两座电影丰碑立下了汗马功劳,老影人一谈起他们,都会竖起大拇指。

去年,徐桑楚故世后,他虽离任已有二十多年,上影老、中、青三代影人都未曾忘记过他,自发前去告别仪式悼念老厂长的竟有两千多人。

那些耄耋老影人没有忘记,在历史政治运动中,老厂长如何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而宁可自己被戴上“右倾”的帽子的;没有忘记“文革”后,老厂长如何雷厉风行地拨乱反正,迅速解除他们身上的枷锁,使他们焕发青春、老树开花的。

那些在“文革”后已步入中年,却又因为“文革”十年的耽搁还未独立拍片的主创人员们没有忘记,老厂长是如何以老带新大胆地把他们推上创作一线的;没有忘记老厂长为



晨曦 (中国画) 张佩华

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都已十分普及的今天,我却始终对“喇叭头”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情。

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吧,上海郊区开始推广有线广播,其后,广播喇叭越来越多地走进农家。简陋是它的最大特色。一个木匣子里装上一只纸盆喇叭,甚至就那么一只光秃秃的喇叭头,拖着一根连接线随随便便地挂在墙上梁上就是。

然而,乡亲们却十分喜欢它,“喇叭头”的称谓中带着颇浓的亲昵成分。

那时,农家很少有时钟手表,喇叭头便代替了它们的功能。一清早,喇叭头就准时响开了。前奏曲好像是《东方红》,随后是用方言说的开场白和节目预告。我的老家在宝山,所以这开场白就是:“宝山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乡亲们一天中忙碌的晨曲也就随之拉开,

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飘起了袅袅炊烟。

喇叭头虽然简陋,播送的内容却十分丰富。上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下到公社广播站自采自编的当地新闻,更有越剧、沪剧、锡剧等地方

喇叭头

赵荣发

戏曲。那时的喇叭头还装到了田头,乡亲们可以边劳动边收听这些节目。所谓日久生情,如果哪一天喇叭头突然停播了,大家就像丢了什么东西似的,心里有些空落落的。

那时候,乡亲们最喜欢的无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沪语节目“阿富根谈家常”。两位播音员自报家门,相互搭档,对农村发生的新人新事、热点问题报道、解释,听来格外轻松自然,亲切受用。

至于我,与喇叭头更有一层特别的渊源。

1982年,我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所乡村中学任教。因为教的是语文,又喜欢写作,所以不久便被乡广播站拉进通讯员行列,很快又与宝山广播电台挂上了钩。那段时间,我有不少稿件在广播喇叭里播出。我的母亲是个不识字的农家妇女,但因为有了喇叭头,她便常常收听到我写的稿件。在



夜光杯

他们担当过各种风险,并在创作中为他们严格把关,切实地扶植他们一部接一部地拍出了不少优秀影片的。

那些在“文革”中出自各种原因而造过他反的人,也没有忘记老厂长在“文革”后重新出山时,只要他们认识错

出品人的品位

陆寿钧

误、吸取教训,仍然发挥他们一技之长,鼓励他们别背包袱,共同为中国电影的繁荣和发展贡献力量。

在老厂长“文革”后执政的十年里,上影厂老、中、青三代人拍出了一大批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优秀影片,在实践中培养出了一大批在全国电影界有重大影响和被观众喜爱的主创人员。那时的上影,社会效果

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我和几位书画家要在本地嘉定办个展览,既然是主题性,就要遵循“讲话”的精神深入延安去生活、写生,获得新的创作灵感。到了延安,我十分激动,黄土高坡的伟岸正如我年轻时读的矛盾的“白杨礼赞”一样,对着黄土高坡的速写笔姿都压在山骨上,渲染之后很有一种宽宏的韵味,与我画惯的烟云江南完全不同。

延安是革命圣地,有了真切的感受,我画这组延安行的组画,重在笔墨当随时代。落日熔金,黄土高坡在逆光的映衬下凝重如墨,气势厚重,我用长线条抒写着“二王”的笔姿,一写逶迤的山影,山影顿然一显北方大山的宽厚。更用赭石和墨晕染,画面沉稳黝黑,透出逆光的镂金。画宝塔山时,厚重的墨色将大半画面渲染,宝塔高耸如青松一般,一派壮观。有了这种真切的体验,我认识到画黄土高坡可用各种技法出新,看你如何刻画入情。我在画延安的窑洞时,仿佛看见革命前辈在艰苦的条件下为了中国的解放奉献的身影,我在画幅上的“留白”鲜亮,春光明媚,很有一种抒情的韵味。这次深入延安生活,我画了十几幅延安山水的创作画,最各有姿,风格别样,特别是杨家岭时,特意画了一棵枣树,寓意革命的前程必结硕果。

学习书法要临好多前人的帖,积淀多了,未创作之前心中就有了一个意象,将自己对前人创作的感受,经过自己的理解再创建一个意象。可见书法的笔姿上升到高度是抽象的。但是搞山水画创作不同,山水是十分现实的景致,你画山水虽然是抽象的笔姿写成,但景致却是山山水水,你能将笔姿的意象与山水的具象结合得生动,也就有自己追求表现的画面的灵气了。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对我来说,这次深入生活更有了丰富的真切感受,你要出新,在画是表现不出画面的时代感的,“笔墨当随时代”,“随”的本质就是深入生活。

我,自然不会过分在意,但母亲并不如此。每每喇叭头里播出她儿子的姓名,她就会在我下班后瞅个空,对我说:“我今天又听到你写的东西了!”说这话时,她老人家的双眸里,总会流露出难以掩饰的高兴神情。

后来,我离开了教师队伍,但我还是经常给电台,特别是给宝山广播电台写稿。不知不觉中,这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喇叭头,仿佛变成了一座没有围栏的“土戏坛”,一任我在上面“唱念做打”,在那份源自于田陌农舍的乡土气息滋养下,逐渐成熟起来。

记得当年《解放日报市郊版》曾发起一次微型小说征文,我的一篇获奖作品《插秧时节》,最初就是在喇叭头里播出的。主人公的原型,是与我一个教研组的老师——农村实行“承包制”了,这位乡村教师既牵挂着学生,又疼爱着自己的妻子,于

七绝二首

念庵

读容安馆札记

如开金匱入通津,
遭泽犹存咳唾新。
碎折楼台人不识,
电光石火烛千春。

钱默存先生读书笔记始于一九三六年二月,《饱蠹楼书记》第二题辞曰:“心同椰子纳群书,金匱青箱总不如。”

友人示旧绘速写小像戏题

此像遗容但取神,
回头逝水照嶙峋。
不知毫发差多少,
纸上惟留半肖身。

是有一天,趁清早时分妻子还未醒来时,悄悄起身去田头插秧……

多少年过去了,那一幕情景,连同喇叭头的身影,依然还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近日网上盛传一北大毕业生发帖,“爸爸,对不起,我没能挣大钱,当大官。”引发了一场对当今社会价值观的探讨。

父母望子成龙本无可厚非,但拼名校、毕业后非要“挣大钱,当大官”不可,这样的人生设计,毋庸讳言既是价值观的庸俗化,又是信仰的严重缺失,客观上看太急功近利了。一位北大学子为自己未能实现父母如此“期望”而心生愧疚,不啻对百年名校、曾是马列主义引入中国的大本营和五四运动策源地的不恭。

如果说春秋战国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思想,碰撞出如孔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一批中国先哲,影响了两千多年的思想、文化和习俗,儒家思想更是有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圭臬,孕育了一大批光照千秋的文人士子,肩负“社稷”重负,以“天下”为己任。

为建党、建国而奉献的先烈们的崇高犹在眼前。时代在进步,社会的主流价值

观或许有所调整。市场经济对传统经济,尤其是人生态度、价值观没有冲击是不可能的,但沾染铜臭、掉进钱袋,让“官本位”思想发挥到极致,人的追求严重扭曲,物化、庸俗化,实在是实用主义抬头,信仰缺失、品位低下

我在百万大裁军中

刘伦贤

